

陈望道与《辞海》

晓 雪

2007 年，笔者应邀受聘为浙江大学《陈望道全集》编委会顾问（后任副主编），因编辑《陈望道全集》所需，专程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纂处调研，查阅了 1961—1964 年期间辞海主任委员各次会议的记录，由此进一步了解了父亲陈望道主持《辞海》编纂工作的一些情况。

1957 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一批上海的文化名人，并在 9 月 17 日晚上接见了舒新城，舒新城借机向毛泽东提出了编辑《辞海》修订本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我会请人大常委会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勉励舒新城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先修订《辞海》，然后再搞百科全书。

经过七个多月的准备，1958 年 5 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次年《辞海》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出任主编，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吕叔湘、陈望道、钱伟长、苏步青、周信芳、蒋孔阳、周谷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夏征农、陈翰伯、罗竹风、黎峰等一批政界、出版界官员，可谓当时出版界最为强大的阵容。到 1960 年 3 月，《辞海》试写稿问世。

1960 年 3 月后舒新城因病住院，11 月去世。舒新城去世后，《辞海》未竟的事业谁来接任？上海市委首先想到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经报送中央决定后，由陈望道接任《辞海》编委会主编。此后，陈望道任《辞海》第二任总主编达十六年（1961—1977 年）之久。

陈望道接手后，在舒新城已完成《辞海》试写稿的基础上，继续对《辞海》进行“修订”。说是“修订”，实际上是重新“编写”。在接下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陈望道为 1965 年版《辞海·未定稿》的出版尽心尽力。在与陈望道共事了二十多年的《辞海》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眼里，由陈望道为《辞海·未定稿》的出版，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树尤多”。

为了提高编写质量，他首先提出了分科主编负责制的建议。

从 1962 年 8 月 9 日至 1965 年 3 月 18 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 23 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在辞海编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建立主编负责制决议，由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各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陈望道说：“主编要负责到底，不仅到出版时，出版后读者要骂，我们也要负责。”

分科主编负责制要求，凡属内容问题，编辑不能随意改动，应与作者联系后多问、多商量。发现什么问题，编辑可以提出意见，但必须由分科主编最后审定。对于技术性问题，可由编辑处理，作者不必多管。这样做，

有助于保证辞书质量。

事实证明，分科主编负责制，实行后效果很好。罗竹风曾说“隔行如隔山嘛，如果编辑自以为是，想当然地改动稿子，往往会因一字、一词之差，而使释文面目全非”。

其次，陈望道主持充实了辞海编委会的人选。陈望道重视识重人才，不仅请了上海各门学科的专家、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参加《辞海》修订的著名专家也都被聘为编委。对于这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为协调好，效率高，陈望道以“定人、定时、定任务”的做法开展工作。

陈望道对各分科的负责人说：辞典应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将遗患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

第三，直接参与和主持了《辞海》试行本的总修订工作。

1962 年 8 月，陈望道主持辞海编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 8 月下旬起对试行本进行修改，接下去即总撰定稿。定稿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修改一遍，陆续编印试排本，供内部继续修改和解决交叉、平衡、统一用语等问题之用。在 1962 年 8 月 3 日上午的业务会议上，陈望道主持对试行本词目的增删和暗交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处理意见，他说：“要明显地弄出几条，举例要当心，宁可少些。要删，要并，不要讲得过详过细，各科还有其特殊性。词目方面宁可多些，解释方面则可少些，有派生的没基本的可作一条提出，但是更具体的可少讲一些。因我们修订是分科的，我们考虑时就要设想到这一点。‘庐山面目’不一定要‘庐山真面目’，因一般讲前者。”又说：“我意分两类，科之内，由科负责。我们要普遍查，但要做分头做。我们要重点查的，是科科之间”。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第二步是在 1963 年 7 月 20 日到 8 月 20 日期间，原班人马再度集中对试排本予以改定，准备等级少数政治性强的条目审定后，即付排印。

罗竹风回忆说，在炎炎夏日，陈望道不辞辛苦，几乎每天或隔日到浦江饭店“督阵”。当时，各学科主要编写人全部集中浦江饭店磨坊，为赶写《辞海·未定稿》而忘我劳动。陈望道常深入到各编写组了解情况，随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有时中午就在那里休息。在休息时，还经常找人谈话。

在最后付排印之前，陈望道对《辞海·未定稿》的前言后记、疑难杂症等问题再次召开主任委员会议进行了讨论。陈望道说：“我很重视前言后记，因为我看书有个经验，总先看前言后记，好的前言后记，提纲领一看就明白。前言不用很长，但要照顾全面，气魄要大，要交代清楚书是如何编的。这前

言是编委会出面的，如何组织人力，我们如何署名也可考虑。写‘水平限制’是谦虚，人家也可问‘既然水平不够为什么写’。我不是反对‘水平限制’，但要多方面考虑。”

为解决“关于多义词的次序排列问题，语词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同音借代简化字复词的排列问题”以及“关于部首引文用繁体字和语词和百科的交叉问题”等疑难杂症，陈望道于 1963 年 2 月 26 日和 2 月 28 日两次主持召开了主任委员会议。

第四，主持制定并健全了辞海编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和保证辞书质量的各项办法。编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先后制定了《“辞海”定稿工作中的组织及各方面的职责》《“辞海”使用专名号方案》《“辞海”汇总编排打印办法》《“辞海”定稿综合整理办法》等文件，并研究了全书如何提高质量，如何解决交叉、发稿、附录和插图审查等问题的方法和相应的措施。

第五，在主持《辞海》修订的同时，同吴文祺、胡裕树一起完成了语言文字分卷的具体编写任务。对《辞海》未定稿中的语法、文字、修辞部分的条目，亲自进行了审定和修改。

在《辞海》修订定稿阶段快要结束时，辞海编委会于 1963 年 8 月 13 日举行主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讨论《辞海》的书名题签问题：一是请国家领导人来题签。二是请书法名家来题签，讨论的结果是：因为《辞海》的修订是以“民间形式”提出的，所以就不请国家领导人也请书法名家来题签，讨论的结果是：因为《辞海》的修订是以“民间形式”提出的，所以就不请国家领导人也请书法名家来题签，讨论的结果是：会上一致推举陈望道题字，以志纪念。现在看到的 1965—1989 年版的《辞海》书名，都是用的陈望道的题字。

在陈望道的主持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辞海·未定稿》终于在 1965 年春夏之交正式出版了。1965 年版《辞海·未定稿》，文字简练、体例严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辞书史上—

笔会

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版，为后来《辞海》各版的相继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 年底《辞海》重新搭班修定时，所以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把《辞海》修订好，并在 1979 年 10 月 1 日正式出版，绝不是什么偶然的。

这里附带说说 1964 年 1 月 3 日陈望道为《辞海》定稿问题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一封信。信里就《辞海》修订工作的进程和最后定稿问题作了汇报，并说“《辞海》反复修改，迄未能定稿”，则则婉言催促中宣部能早日下达“定稿纲领”，这样他们方能“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加工”。但从后来出版的情况来看，陈望道的这封信应该没有什么结果，不然也不会出版 1965 年版《辞海·未定稿》了。

关于《辞海》，罗竹风回忆说：是否可以以说，从修订《辞海》开始到十六本分册出版是第一阶段，由舒新城任主编；从十六本分册出版到《辞海·未定稿》合拢为第二阶段，由陈望道任主编；粉碎“四人帮”到正式出版是第三阶段，由夏征农任主编。其中第二阶段工作量最大，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也最多。辞海编委会成立后，以近五年的时间主持编出了一部 1160 万多字的《辞海·未定稿》，其中后四年是在陈望道的主持下进行的。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在 1949—2009 年间总销量超过 600 万部的统计推算，《辞海·未定稿》版从 1963 年开始内部发行至 1979 年的 17 年间，发行册数至少超过了 100 万部。

陈望道对“辞海”的修订可谓呕心沥血，对“辞海”也充满了希望。陈望道说：“我认为辞海特点，集思广益，党的领导，主编负责制。”又说：“这部辞典是新辞典，是别地没有的，编写辞海的方式也是解放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辞海在贯彻双百方面也是独创的。”“预料将来这部辞典出版，我们的经验很可以总结一下。”“希望快点成功，而且成绩很显著。”遗憾的是，由于 1966 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辞海》的修订工作未能按时完成，陈望道直到去世（1977 年 10 月）也未能见到《辞海》修订本的面世。

今天，《辞海》已经一版再版地正式发行至第六版了，第七版的编纂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陈望道曾将大量心血倾注其中，是值得广大读者纪念的！今年又恰逢陈望道先生辞世 40 周年、《辞海》第一版面世逾 80 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2017 年 1 月 26 日于美国 Metamora 寓所



春天的美味

王 琰

山东土菜“茴香苗拌豆腐”。味道鲜香。我在家自己学着做，尝一尝，总觉味道不及。原料一模一样啊？

香椿芽上市，与豆腐同拌味道极好。各是各的鲜美。有次去外地出差，闹肚子，吃啥都不舒服。朋友说，你等等啊。不一会儿他回来了，端来一碗白水煮豆腐。据说吃当地豆腐，专治各种水土不服。真管用。朋友说，若来得正是时候，吃香椿苗更见效。

每逢谷雨，北方吃香椿，南方喝新茶。我们酒店有一道地方小吃“炸椿鱼”。时令菜，过时不候。新鲜香椿洗净，控干水分，加细盐粉揉搓均匀，在调好的面粉里蘸一下，动作要快，时间一长，面粉蘸不匀，厚此薄彼，不但影响口感，卖相也不好。热锅冷油，小火慢慢炸至金黄。香椿往往是整只，炸好后形似一条一条小鱼，北京人叫“香椿鱼儿”，太原人叫“炸鱼鱼”。金黄色包裹着碧绿，外脆里酥，香气扑鼻。“前椿芽嫩无比，后椿芽生木体”——老北京吃香椿习俗已久，爱吃于是种得也多。走在北京街头，路标名与香椿息息相关者随处可见——椿椿街香椿胡同椿树院椿树巷椿树胡同椿树街……简直一个椿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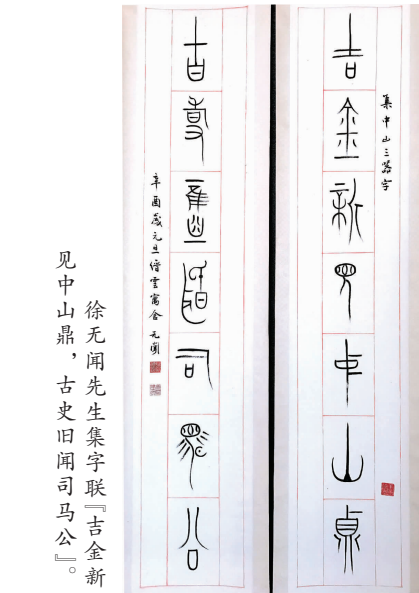
香椿品种不同，身价与吃口天渊之别。新芽呈亮棕红色，是上品，这种香椿芽茎叶肥嫩，香气更浓，拿到市面卖，价格常高出一倍。想吃要抓紧，就那么几天。若呈淡红色甚至发绿，品质则差了许多。吃口发硬，嚼不彻底，太原话叫“柴”。我奶奶每年要赶在香椿树发芽前，在每个枝头芽眼上扣一只“蛋碗儿”（生鸡蛋壳儿，口开的越小越好），一来保温，二来可以利用蛋壳里剩余的蛋液滋养嫩芽，使其长得更快更好。

儿时记忆中，老宅屋前房后，空地夹道，到处可见香椿树。种这么多干嘛？奶奶笑眯眯地念叨，“椿芽咕嘟嘴儿，加吉就离水儿”。想她的股东老家了。“红加吉”是一种鱼，颜色鲜亮，胶东人有开春时椿头楂鱼鲞习俗。红加吉买来，鱼腹并不剖开，全部内脏必须自鱼嘴处摘除，保留完整的鱼籽与鱼鳔。这种鱼的鱼籽结实而饱满，鱼鳔就是一只椭圆形气泡，也叫“鱼泡”，许多人直接丢弃。太可惜。但也不能直接成菜，会被视作对客人不敬。我奶奶有独门秘诀——掏鱼鳔须小心，不能戳破，清洗干净后开个小口，把已经刺头的宰馅（常是精瘦肉），与刺碎的椿头

（香椿芽）拌匀，往鱼鳔里慢慢填。鱼鳔塞满后鼓鼓囊囊，用一根竹筷再慢慢送回鱼腹里。烧好端上桌，色香味俱佳，外形完好无损的一条加吉鱼。

香椿苗有些老了，做凉拌菜吃口差，我奶奶改做“椿头丸子”。把香椿叶剁碎碎的，加食用油，加碎肥膘（精瘦肉没粘性），打几颗鸡蛋，加面粉加淀粉，具体加多少完全靠手上经验。充分搅拌。最后加盐粉，撒一把黑白胡椒调味，再接着搅拌至半个钟头。尝尝咸淡。用两只小调羹上下那么一扣，就有了丸子形状，入油锅炸去。炸丸子，冷锅冷油，油至七八成热，我奶奶叫“旺油锅”，看油面香烟微微浮起，入勺小心地搅动，听见“噼噼剝剝”轻微声响。可以下丸子了。周围立马泛起大量气泡，油爆声“刺刺拉拉”。改小火。丸子通常要炸两至三遍，色泽再加金黄，吃口更酥脆。奶奶一次要炸很多，冻起来慢慢吃。吃火锅吃大烩菜，起锅前抓一把，焖三两分钟，鲜美无二。

因香椿季节性强，只适宜在早春时采摘，最常规的处理方式，是盐渍封存。幼时记忆中每到春天，学校大院的



徐无闻先生集字联“吉金新见中山鼎 古史旧闻司马公”。

词汇是人们赖以沟通思想、进行交流的基本语言单位，有一类历史文化信息密缩而成的词汇特别有意思，比如“推敲”，从在特定场合发生的差别其实不太大的 push 和 knock 这两个具体动作，演变为使用相当高频、语意全然不同、二字不能拆分的 weigh 或 deliberate 这一意义，这一演变过程不知何时开始，又是如何发生的，只是觉得精妙极了。

另一让人击节称赏的词汇是“影响”。这个词的年龄比“推敲”还要老得多，在先秦典籍如《尚书》中，它是影之于形、响之于声即快速回应的意思。作为它后来基本意义的 influence 如何形成，一时亦不能确指。“推敲”起来，会发现在这个基本语义上，用“影响”两个字来指称是多么的恰切。

影响是什么？它不是由施而受冷冰冰的指示，更不是自上而下硬邦邦命令，它是由受向施自然而然的接受。受是自然而然，施则常常是不知不觉，不要说勉强和被迫，甚至连有意、自愿都谈不上，在彼此皆不经意间，“影响”就产生了，这与影的无声无响、响的影影绰绰，多么的神似！

我们每个人或短或长的一生，免不了都要接受很多指示乃至命令，这种指令有时轻而易举地决定人的一生。不过，关乎人一生胸次之涵养、行事之风规的，却往往不是看起来暴风骤雨般的指令，而是春风化雨般的“影响”。年过半百，回首前尘，一件事、一句话，当时只道是寻常，却在以后的流光岁月中证明着它所产生的当时并不能完全估量的影响，我为此深为感慨，更满怀感激。

影响如好雨

刘 石

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念书时，有一次午饭间，端着饭盆随同学去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何靖老师家串门，说是家，也就是离学生宿舍不远，跟学生宿舍一样，中间过道挂满衣物，俗称“筒子楼”的单身宿舍。今天想来够简陋了，但对八人一间的我来说已经足可羡慕，不过更可羡慕的，是进门看到迎面窗子两边狭窄的墙壁上挂着一副对联，出自父执徐无闻先生之手，是徐先生最拿手的“徐氏玉簪”，原本因年久失修且光线不佳而显得灰暗的斗室，一下子在我面前变得春和景明。

从那时起，当老师，并且像何老师一样拥有一个单人房间、悬挂一副徐先生的对联，便成了久悬心中的一个“小目标”。毕业经年，有的同学当上了大官，有的同学住上了豪宅，我全然不觉羡慕，只因心中有何老师的那个单间在。虽然后来也曾为朋友向徐先生求过对联，并且是令世人惊艳的中山王器字，但却一直未敢为自己开口。不意徐先生以 62 岁盛年辞世，原以为这一目标从此只能化作梦想，潜藏于心目，未料多年后，竟蒙徐先生夫人李淑清教授及公子和女公子徐立、徐定兄妹厚爱，获赠一副令人魂牵梦绕的中山王集字联。此联字体飘逸精妙，书风沉博绝丽，内容则雅致到无以复加：“吉金新见中山鼎，古史旧闻司马公。”（见题图）从此寒舍如开过光似的神采熠熠。有时一天在外，公务奔波，常常自问胡为乎泥中，速返至家，伫足联前，则感尘嚣顿减，世虑尽消，一种复杂而神奇的感受荡漾于胸中，言语实难以尽道也。

溯源于学界久矣，谁都知道学界最常见的活动是开各种学术会议，或开各种假学术之名而行之的会议，但我却很少参加这类或真或假的会议。现如今的学术交流固然不必以舟车劳顿的形式实现，即使在前信息化时代我也不太爱干这个事。为什么？2015 年 10 月间北京师大举行的庆祝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会议上，我说了一段大意的话：

刚才各位都非常专业地评价了聂先生的学术贡献，也深情回顾了聂先生对自己的教诲与提携。在这这么多年来进步不及，所以不敢说从聂先生那儿得到了什么启迪。好在古人说过“不贤识小”，我就说一点小的吧。当年聂先生对我们说过一段话，他说“我尽量不去开会，因为开会之前得准备两天，开会要花去两天，回来收心还需要两天，一个星期就没了，多浪费时间啊”。人们常说听话的学生才是好学生，我自忖算得上聂先生的好学生了，因为从此这段话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会后聂先生问我，我对你们说过这话吗？

我于是想，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何靖先生，他一定会也这样说，到我我家来吗？

随风顺入夜的好雨，不仅不居功自傲，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一丝的自我存在感，天壤间的万物却于是乎得以生长。

“影响”如好雨，谁说不是呢？

回音壁

没有“娇红”

程毅中

3 月 22 日在《笔会》版上读到孟晖先生《灯花眉黛付多情》一文，谈到戏曲《娇红记》的基本情节来源于更早的《娇红记》小说，从而对戏中的“灯花”一词作了详细的解释，读后得益不少。可是文中屡次把女主角的名字称为“娇红”，却是误读。无论论戏《娇红记》还是小说《娇红记》，女主角都是王娇娘，并没有“娇红”其人。《娇红记》得名于主角娇娘和配角飞红两人的名字，这是元明小说取名的一个习惯，《金瓶梅》就是循此成规命题的。我认为元人宋远的《娇红记》是《红楼梦》之前爱情故事写得最好的小说，可惜因为是用文言写的，所以很少人注意它，很希望孟晖先生还能再详尽地评介一下。